

曾國藩全書

挺經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

主编：张明林

(第八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第十卷 砥砺人生 自强不息

——“砺志”法

君子立志，有博爱世界一切人和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以比不上虞舜、比不上周公为忧，以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为忧。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四方各少数民族侵犯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迫害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得不到自己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这就是所谓的悲叹天命而怜悯人穷。所有这一切，都是君子所忧虑的事情。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伸，自己一家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忧虑。

第一章 曾国藩论“砺志”经典

一、君子之忧，悲天命而悯人穷

【原文】

君之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立志，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民众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胸襟气度。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这样奋发有为，才无愧于父母生养恩情，不愧为人世间最崇高的人。所以，值得他忧虑的，是事业成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是为不修道德不精通学业而忧虑。因此，当社会腐败，坏人顽固不化就忧虑。外敌入侵，干扰人民就忧虑，小人当道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就忧虑，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惠帮助就忧虑。这就是常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优秀品质，是君子们担忧的大事呀。至于一人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具有壮志的君子是没闲工夫去忧虑伤神的。



二、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译文】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

【原文】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译文】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不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可见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第二章 曾国藩“砺志”解读

一、做人从立志开始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

然而，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我常常感到了生活的庸俗，但是我们并不常常产生改变它的志向。曾国藩就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万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

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销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省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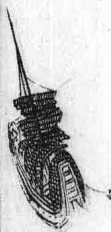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大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的说的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就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



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你能做到吗?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收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有所作为。

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到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自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有志者事竟成。晋朝有一个人叫王欢,字君厚,专心学问,不知生计。他家中也无存粮,常常乞讨度日;但王欢仍诵读《诗经》不已,怡然自乐,毫无穷困之意。他妻子却为生计担忧,盛怒之下,便烧掉了王欢的书籍,并且要求改嫁,想促使王欢改变志向。王欢却笑着对妻子说:“你没有听说汉朝的朱买臣的故事吗?他贫贱的时候,他妻子也要求离去,后来朱买臣回乡做官成为太守,他的妻子就上吊身亡了。”时人听说此事后都耻笑王欢,而王欢则始终守志不移,安贫乐道,后来终于成了大学问家。

这故事虽有几分凄侧,但是真实的。一个人在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之前,往往都有和王欢相同的遭遇,那就是不被人理解,尤其是那些胸怀远大志向的人,就更是如此。人的理想越远大,那么理想的实现越艰难,也就越容易被人嘲笑,很多人的很多美好的理想不是被自己扼杀的,而是被他人的嘲笑扼杀的。能像王欢那样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太少了。

不管怎样,有志者事竟成和王欢的事故一样,都是对人的一种召唤,一种诱惑,一种刺

激,但愿它能唤起你潜在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人不仅要立志,而且志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亦即《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曾国藩初时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是个砺志聪明的人,而且记忆力很强。据说九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十四岁那年,有位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夸奖。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诗题,教曾国藩当场做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除了继续苦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五年(1826),曾国藩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居然得了第七名。曾麟书感到这孩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但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孩子的前途。无奈中,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贴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又回到本县的莲溟书院继续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进步。

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可巧,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



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兴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句箴言以自砺：

1. 立志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祿，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2. 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格齐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在，伐生我性。谁人可忧？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忧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3. 主静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凯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4. 谨言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贾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汝既髦！

5. 有恒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

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闭或忿。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从这五句箴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予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这五句箴言，我们都均可作为座右铭，青年人读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无穷。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经过一番苦读，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颇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

二、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为首

德本来不在人身上，它在人以外的地方。人不过是一水池，等待着水的来临，人越长越大，水池也越来越大，人的任务就是须留住水，不使它泄露、外溢，这水就是德，这蓄水就是养德。人不是别的，他只是德的看护者。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即使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国藩看来，这三不朽中立德最难，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

《国语》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立德之难。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空洞的，无形的，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又确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有时它表现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但做一件善事并不等于立德。因为驱使人做一件好事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就是一个人的德行所致，有时则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再比如一个有德行的人，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但是他实在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德行就在他的心中，然而我们无法看见德行是否在他的心中。

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个人化的。我之所以做好事，不是因为他人需要我的帮助，而是由于我的内心存在着一种帮助他人的冲动、愿望和要求。我是本着自身的内在需要而行事，因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就是我的法令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中庸》讲“慎独”，就是说君子在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尤要谨慎。如果一个人以为没有他人看见就可以放弃道德修养，那他就达不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立德之难还在于它是无法言说的,我做了一件好事是不能向他人表白的;否则就有邀功的嫌疑,或者想得到他人的肯定与承认,然而这并不能构成一个人做好事的理由。再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完全是为着自己积累德行,为着自己的德行反而以此向人请功,还有比这更不道德的吗?清朝朱柏庐说:“善欲见人,不是真善。”这是一种不可表白,还有一种不可表白,就是在修炼时,自己有了一点心得体会,一经说破便无所回味了,这也就是对道德的放弃,那些喜欢在世人面前表白体会的人,常常是些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的人。

一个人不可无能,但不可逞能;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贤能的臣子多了,国家就强盛,贤能的孝子多了,家庭就兴旺。贤能的人或多或少,一半在人谋,一半在天命,不可强求。大体而言,能人总是多多益善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可以能而不贤呢?或者,一个人就该显得比他人更高明、更强大、不可一世呢?

曾国藩说:不错,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其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外一种强大的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强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陵、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其终身。所以我们在自我修炼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众或尊严。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周易》中说,“谦谦,君子。”即人在任何时候都谦虚,才算君子。《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明代哲人王阳明也说:“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意思是说:谦虚,是诸多善行的基础;骄傲,是诸多过失的罪魁。曾国藩也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一定要谦虚,不讲任何条件,而后才能做到真实无妄,所谓真实,



就是不欺骗。

那么人为什么在欺骗他人呢？

人之所以要欺骗他人，是因为他心中别有私见，不可告人，也不敢告人，尔后制造谎言以欺骗世人。为了使欺骗不出破绽，于是只好编造更多的谎言，最后他就生活在自己所编造了的诸多谎言中，恶性循环，无以自拔。他不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他有私心杂念，他有各种各样的企图或者妄想。倘若他没有私心杂念，他何必自欺又何必欺人呢？

在曾国藩看来，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的人，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

人生来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成功之者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

治学之道，最紧要的是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一个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学问长进得越快。

治学，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务实精神，避免奢谈，踏实认真。要明白学问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学问好比金字塔，基础越深越博越好，这样才能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高精尖。

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同时，治学须避免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正依赖于不俗的才学，一个人就可以为国立功，为己立德，为人立言，受到后人的敬仰。

曾国藩的事业成功，得力于他不断地砺志用事；他在同治元年（1862）给次子曾纪泽的书信中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

气质本自天赋，虽父兄亦不能改变子弟。但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改变气质。他虽自己才智钝拙，由于他能立志勤学，终成有清一代显赫的人物，这实是他力学的重要证据。

砺志必须“用世”，也即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曾国藩和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结为“湘乡三剑客”，互相勉励的事尤足以传为佳话。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被顺利地中翰林后，更加助长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他的诗歌中，经常有抒发高远志向的篇章。他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自信地表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亲友的信中，阐述得更为明确。如在给刘蓉的信中写到：“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也表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他要按着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要求自己，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曾国藩刻苦学习,广为读书。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治学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在家师唐鉴和倭仁后,他自立课程十二条,来督促自己:

-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 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叶为率。
- 5.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
-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 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 9.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 12.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能为自己规定功课,并按日施行,这种自制自律的精神,实为难得可贵。曾国藩正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才有日后事业的成功。

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他既不必为实际政务所劳扰,又可以从容阅读翰林院所保存的丰富典籍。曾国藩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广为交友,尽量在经史、文学、政治、军事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问。在不断的刻苦学习与良师益友的切磋中,他逐渐寻找到适合自己治学的门径。

他进入了治学的新境界。

曾国藩一生赖以成功的学问和志向,都是在此时奠定的。经过一番勤奋的努力,曾国藩在学识上已颇有见地,自成一家。然而,曾国藩却没成为一位学问家。主要原因是,他在中进士前,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考科举,只能称得上是闭塞山区的陋儒。及至被点中翰林后,才开始解脱八股的桎梏,开始从事学术的研究。他自我教育的时间很快便由于他职位的迅速升迁,以及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被迫中断。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著书立说时,就已被擢升为二品大员。从此,天天忙于公务,学问便也就无缘过问了。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他墨经出山,带兵打仗,在血雨腥风中,过着栖惶不安的日子。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他已被推向“中兴名臣”的行列,更无法恢复著书立说的生活。因此,曾国藩一生中的著述并不丰富,而学术著作更是寥寥无几。做学问需要安定的环境,热衷功名利禄的人是成不了大学问家的。

三、一生成就都在“砺志”中取得

曾国藩一生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砺志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取得的。而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砺志”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在他这数千封家信中,他以亲切



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表达了在砺志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等种种感情。

人们可以从这些信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身居高位者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上对皇帝、上司以及同级、下级都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生动有趣,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意义的教训和经验。有人说,它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应该说,这些家书的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曾国藩一生以“砺志”相标榜,在家书中,对待亲人,它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其中,不夹杂着世上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份,这是最能感人的。在家书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教训其弟弟的,之所以能不引起对方的反感,恐怕就在于这个“砺志”上。

曾国藩在京任职时,还担负着教育诸弟的责任。他叫几位弟弟寄文到京,改阅后再寄回去。

曾国藩还充分利用在京师十三年的便利条件,广为交游,博览群书,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统治劳动人民的经验,为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正襟危坐于简陋的书室,认真思考,努力实践,年纪几近七十,学习还是严肃恭敬。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教育曾国藩研究经学应该专于一经,如果一本书理通,那么可以再旁及他书。倘若急于求精且博,那么一经也弄不懂。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做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引文中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又称作经世致用之学。当时“经济”的含义十分广泛,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所运用的“经济”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贴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



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在以后写给诸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阐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因此,他立志要在理学上痛下功夫,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及克己省复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于是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国藩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

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众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深刻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功夫。

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1884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靦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平行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

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日记中如此自刻自责的话语随处可见,表明了他要在理学慎独上痛下功夫的决心。

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的进步。

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易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的“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则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足供后人终身取法。论史料,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首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以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所以曾国藩的日记,实在是一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著作。读了它,我们不但见到曾国藩的砺志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对其《挺经》中的砺志方法,有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曾国藩还为自己规定十二条课程,规定每日必须做到: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刚开始静坐很不习惯,每坐片刻即昏然入睡,等到醒来,半天已经过去。为此,他常常是气恼交加,在日记中痛下决心,要从头开始。如此反复,经过十余天才逐渐适应。但是,曾国藩原本体质孱弱,自学习理学家的“躬行实践”的修身方法以来,刻刻留心,无时不惧,因此每天高度紧张,心理压抑,甚而失眠、咯血,再也无法继续坚持下去。

第三章 曾国藩“砺志”感悟赏析

有志者事竟成

【原文】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干我哉!

【译文】

人如果能自己立志,则做圣贤、做豪杰,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呢?还何必要借助于别人的力量呢?“我想得到仁的品德,这仁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除了孔孟的东西别的什么也不学,谁能够阻止我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则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同住,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自己能从圣人那里学到什么呢?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原文】

譬如人欲之京师，一步不动而长吁短叹，但曰京师之远，岂我所能到乎？则旁观者必笑之矣。吾愿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

【译文】

譬如有一人想去京城，一步不动，却整日长吁短叹，口中只是说：“京城太远了，我怎么能走得到呢？”则旁观者必定会笑话他。我希望我的弟弟一步一步地向前进，一天也不停止，这样自然会有到达的那一天，不要计算目标的远近而整日只是长吁短叹吧。

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

【原文】

与胡中丞商江南军事，胡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二人互许为知言。

【译文】

与胡中丞商议江南军事，胡中丞说凡事都要全神贯注地去做，一心二用，必然不会成功。我也说军事上不每天取得进展，便会一天不如一天。我们都认为对方说得有道理。

以静制动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译文】

凡是疾病缠身的人，而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疾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办法。

耳不两听 目不两视

【原文】

书虽不可不看，弟此时以营务为重，则不宜常看书。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译文】

虽然书不可不读，但是你现在应以军务为重，不可经常读书。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专心致志就可以做得很好，三心二意就会力量分散，做不好事情。荀子说耳朵不同时听两种声音就会很聪，眼睛不同时看两种东西就会很明；庄子说不胡思乱想，才能聚精会神。这些都是至理名言。

凡事皆贵专

【原文】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译文】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贵在专一。拜师求学不专一，则所获得的教益就不深；结交朋友不专一，则认识人很广泛却都不亲密。当心中有了专一的崇尚以后，再广泛地涉猎其他领域以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也无不可。如果心里没有专一崇尚，却见异思迁，眼花缭乱，则是非常错误的。

人贵有志

【原文】

接泽儿八月十八日禀，具悉。择期九月二十日还湘，十月二十四日四女喜事，诸务想办妥矣。凡衣服首饰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纪鸿于二十日送母之后，即可束装来营，自坐一轿，行李用小车，从人或车或马皆可，请沅叔派人送至罗山，余派人迎至罗山。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闻此言，然物论悠悠，何足深信。所贵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省三、琴轩均属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识微之论，而实不能平心细察。余所见将才杰出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

余病虽已愈，而难于用心，拟于十二日续假一月，十月大奏请开缺，但须沅弟无非常之举，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则别有波折，又须虚与委蛇也。

【译文】

接泽儿八月十八日的来信，详情尽知。选择日期九月二十日回到湖南，十月二十四日四